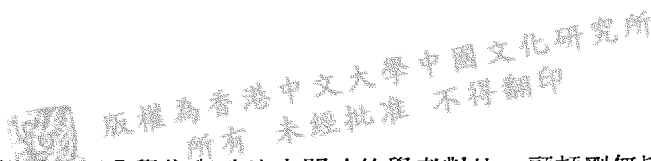




顧頡剛的新古史學

許冠三



與梁啟超、胡適一類「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學者對比，顧頡剛無疑是一位純學人。不過，他並不是那種「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讀書種子。」他是有政治關懷與牽引的，但與王國維的私忠舊主相反，他只以民族前途為憂，生民休戚為念。他一生熱愛學問，極力追求真知，更珍惜學術真誠，雖賣稿之事亦不輕為。另一方面，他又忘不了知識分子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所以他早年參加過社會黨，一度且「是一個最熱心的黨員，往往為了辦理公務到深夜不眠。」後來又想寫一部說明中國前途「終究是有望的」通史。他對邊疆少數民族史的關注，多半是緣這一主題而生。¹「九·一八」事變後，激於「強鄰逞暴，國土日蹙」之勢，不甘坐為「釜中之魚，」遂以「一半的精力」搞通俗讀物，「宣傳民族意識；」²又以一部分時間推廣學用結合的歷史地理學，以致延誤了他的古史研究專業。然則他始終堅持致知與致用兩分，務求二者並行不悖，並不斷申明純學術研究的歷史意義。³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決不以學干祿，亦不曲學阿世，或屈學從政；也不隨波逐流，去搞「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假漢學或假科學。⁴可惜數十年來講論顧氏學行的人，連他最親近的師友、學生和愛慕者在內，泰半只看見他是「古史辨的中心人物，」以及他在古史學領域的有形影響，而忽視其學格與人品的深長含義。即使是述學，也多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等而下之的，自不免以偏概全了。例如，當他在二十年代中初露頭角之際，一位極力迴護他的師長恭維他說，頡剛「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來「研究古史傳說的經歷；」他這個「根本觀念是顛撲不破的，他這個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見效的。」儘管「他初次應用這方法，在百忙中批評古史的全部，也許不免有些微細的錯誤。」⁵又說，他是繼瞿述之後在古史研究上進行「第二次革

¹ 《古史辨》，〈一序〉，一七，八九-九〇。

² 《古史辨》，〈四序〉，五。〈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下），《中國哲學》第六輯，北京，一九八一。《史林雜識》，〈小引〉，北京，一九六三。

³ 參看《古史辨》，〈一序〉，二五-六、三二、八一-三；〈二序〉，一二七；〈三序〉，一、九；〈四序〉，五-七；〈五序〉，三。又《北京大學國學門周刊》序，一：一，一九二六；〈悼王靜安先生〉，《文學周報》第五期，一九二八。

⁴ 侯外廬評胡適新漢學語。見《胡適思想批判》三：一七，北京，一九五五。其實唯物史觀派的史家又有幾人不是搞「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假科學？

⁵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古史辨》，一：一九二-三。

命」的學人，「拿了一把更大的斧頭，」「一劈直劈到禹，把以前的古帝王（連堯帶舜）都送到封神台上去。」他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⁶ 一九七零年前後，一名西方青年漢學家竟簡括顧氏史學為十個字：「從文獻批判到社會批判」（From Textual Criticism to Social Criticism），亦是只見其破不見其立。⁷ 及至八十年代，悼念他的故舊却又棄大取小，畧破詳立。盛言他的《尚書》研究，刻意突出其《尚書》專家形象，稱贊他晚年發表的幾篇《尚書》校釋譯論都是「超越前人的著作，」且為「史學著作提出一個新體例。」至於對顧氏古史學有特殊意義的民俗學取徑，反而置於次要又次要的地位，只輕輕帶過了事。對於「故事的眼光」和「民衆心中的古史」兩大重要概念，更是隻字未提。⁸

（一）

頡剛的疑古辨偽史學，從學術源流看，是遠承姚際恒、崔述、鄭樵與劉知幾的批判傳統，近宗晚清公羊學派論託古改制和新學偽經的大膽假說。⁹ 從際遇上說，它的孕育與成長，實歸功於民初革命風氣的感染，新文化運動的鼓舞，尤其是北大師友的指導、誘掖、欣賞與迴護，以及北京大學所提供的種種方便。據一九二六的自述：「要是不遇見子水和太炎先生，我就是好學，也不會發生自覺的治學的意志。要不是遇見孟眞和適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積着的許多打破傳統學說的見解也不敢大膽宣布。要是北京大學中不徵集歌謠，我也不會因寫錄歌謠而聯帶得到許多的風俗材料而加以注意。要是我沒有親見太炎先生對於今文家的痛恨，激動我尋求今文學著述的好奇心，我也不會搜讀《孔子改制攷》，引起我對於古史的不信任。要是我不親從適之先生受學，瞭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也不會認識自己最近情的學問乃是史學。要是適之、玄同兩先生不提起我的編集辨偽材料的興趣，獎勵我的大膽的假設，我對於研究古史的進行也不會這般的快速。」「要是我不到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服務，沒有《歌謠週刊》等刊物替我作徵求的機關，我要接近民衆的材料也不會這樣的容易。總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學來，或是子民先生等不爲學術界開風氣，我的腦髓中雖已播下了辨論古史的種子，但這冊書是決不會有的。」¹⁰ 其中胡適與錢玄同的指導與激勵最具關鍵性，至於

⁶ 胡適，〈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古史辨》，二：三三八。

⁷ Laurence A. Schneider, *From Textual Criticism to Social Criticism: The Historiography of Ku Chieh-ka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VIII, 4 (August, 1969);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hap. VI. (Berkeley: 1971).

⁸ 白壽彝，〈悼念顧頡剛先生〉，《史學史研究》，一，一九八一；《歷史研究》，二，一九八二。

⁹ 參看《古史辨》，〈一序〉；《編寫》（上），《中國哲學》，第二輯，北京，一九八〇。又《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序〉，上海，一九五四。

¹⁰ 《古史辨》，〈一序〉，七九—八〇。

王國維，雖然顧氏會一再表示愛慕之忱，但王氏對他的影響，其實是有極限的。例如早在一九二四年，他已在日記中稱王是他「學問上最佩服之人。」¹¹ 一九二七年六月，王自沉於昆明湖後，他又在追悼文中以王氏對他的影響與康有為的相提並論，說王教他「怯」，教他「細針密縷」；康教他「勇」、教他「大刀闊斧」。又說王的古史學與崔述、康有為不同，「崔、康們是破壞偽的古史，而他是建設真古史。」¹² 而死後才發表的晚年回憶錄更宣稱，在二十年代中，他「那時真正引為學術上的導師的是王國維，而不是胡適。」又抱怨「數十年來，大家都只知道」他「和胡適的往來甚密，受胡適的影響很大，而不知」他「內心對王國維的欽敬和治學上所受的影響之深。」¹³ 不過細讀顧氏述作的人都能指證，心儀雖為實事，引為導師之說却是虛言。他一生不走「二重證據」路綫，極少利用王氏賴以成名的文字遺跡與實物，便是顯證；更不用說他甚少「細針密縷」之作了。唯一的例外，或許是在《尚書》研究領域。遠在三十年代中，他已在盡量利用王氏的研究成果。去世前一年才發表的〈盤庚三篇校釋譯論〉既重視版本校勘，又引用契文與金石文為證，特具王國維風格。¹⁴

反觀北大師友的影響，真是無處不在，胡適烙印更是歷久猶新。如《古史辨》冊一來往書信所示，顧氏實際是在胡、錢示範與誘掖之下走上疑古辨偽道路的。前者既授之以「寧可疑而過」的立場和「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的大前提，又啓之以疑辨門徑，領他認識姚際恆，重視崔東壁。¹⁵ 後者則提供注意焦點和發抒議論的機緣。錢氏期之以同道，待之如學友的熱忱，處處鼓勵他大胆。是以他的「大胆的假設」，從孔子未刪六經直到震撼史林的「層累」說，都是先向錢氏吐露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文，更是應玄同先生「離經叛道」的邀請而寫。¹⁶ 連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說，也都是經由玄同的推獎而深入顧氏思維系統核心的。¹⁷ 至於胡適的影響，並未因三十年代後的人事疏遠而終止。¹⁸ 他的晚年著述仍時有胡學烙印出現。〈聖賢觀念和字義的改變〉一文所

¹¹ 《編寫》（下）。

¹² 〈悼王靜安先生〉，原載《文學周報》，第五期，一九二八。轉引自《王觀堂先生全集》，十六：七一二七，七一三二，台北，一九六八。

¹³ 《編寫》（下）。細校此文有關王氏的其他陳述，頗疑此稿原文曾經改竄。除引王為導師一節外，言王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後，「在幾年裏」便「寫出幾部民族史，疆域史等著作」等語，亦不似顧晚年應有之筆。按王氏在清華國學院任教先後僅兩年一月有餘（一九二五、四至一九二七、六），何以此處作「幾年」？又在這兩年當中，王氏所撰史學論文可致者名為十二篇，實得十篇，其中最長的是〈韃靼考〉，連〈年表〉在內，亦不過一萬六千字左右。〈金界壕考〉，只七千五百字左右。何來幾部之說？顧氏雖不以謹嚴稱著，然晚年之作何能有此淺顯錯誤。然據此文中之其他誤字推想，前述謬誤亦可能出於手民誤植或校對疏忽。

¹⁴ 與劉起鈺合撰。載《歷史學》，第一、二期、北京，一九七九。

¹⁵ 《古史辨》，一：一、五、六、十二、十五、十九、二二、三。又〈一序〉三、四、三六。

¹⁶ 《古史辨》一：二四、五、二九、三一、四〇、四、四五、七、五〇、七。

¹⁷ 《古史辨》，一：二四、三〇、四〇、五二。

¹⁸ 據顧說，他與胡疏遠是從一九二九年起，「九·一八」事變後對胡氏「無視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麻木不仁的態度」有「極大的反感」，一九三二年因寫〈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而生學術分歧。《編寫》（下）。

用的演進法，固然似會相識；¹⁹ 即使是在頗有王風格的《尚書》諸篇校釋譯論中，〈爾汝篇〉的影子也是依稀可辨。²⁰

顧剛古史學所得力於胡氏的，主要是研究方法，尤其是歷史演進分析法。因為他自覺「有了新方法，」才敢「放大了膽子而叫喊出來。」箇中原委，《古史辨》第一冊〈自序〉說得極明白。他指出雖然康有為已「揭出了戰國諸子和新代經師的作偽的原因，」使他曉得「要看出偽史的背景，就從偽史上去研究；」不過，直到他讀了胡適用他從美國帶回的西洋史學方法寫的作品，「把傳說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說中的故事舉了幾個演變的例，」他才領悟到，辨偽的史家，「要去研究偽史的背景，」「要去尋出它的漸漸演變的綫索，就從演變的綫索上去研究。」²¹ 其中辨論井田制和攷證《水滸傳》的文字，又使他聯想到「研究古史也儘可以應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對於某些古史傳說，如堯舜禪讓、孔子師徒彈琴解厄人之困等，亦儘可用戲曲「故事的眼光」去瞭解；對於古史中的若干典型人物，如堯、舜與桀、紂，亦儘可用戲劇「角色的眼光」去攷察。²² 因此，在歷史演進法的利用上，顧是既有繼承，也有翻新的。根本差異在於：胡以研究歷史的眼光和方法去研究故事；顧則反其道而行，以研究故事的眼光和方法去研究歷史。其次，便是胡法的根基在板本源流；而顧法的**大本**在故事演變和角色塑造。這就決定了二人在方法上的形同質異。顧氏既以故事的眼光看古史傳說，焉能不對它生「特殊的了解？」因而提出胡氏所不敢提的「大膽的假設？」是以，要瞭解他治古史的門徑，除崔、康、胡三家成法而外，決不能忽視那「故事的眼光」和「角色的眼光；」要明白他的辨偽學說，決不能撇開他與民俗學的因緣。誠然，如單就層累造成的古史假說而言，他的方法無疑只是崔、胡先例的活學活用。²³

顧氏與民俗學的關係是從聽民間故事開始。這可以上溯到坐「連檯交椅」時代，老祖父給他講「蘇州徐文長」的滑稽故事，祖母則講「老虎外婆」之類的神話。到六、七歲時，他已着手讀些唱本小說。²⁴ 一九一三年，他攷上北京大學預科，很快就成了戲迷，自然留意起角色、劇情和故事的變化，由是便生出許多問題來。「深思的結果，忽然認識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會得變遷的，從史書到小說已不知改動多少，從小說到戲劇又不知改動多少，甲種戲與乙種戲同樣寫一件故事也不知有多少點不同。一件故事的本來面目如何，或者當時有沒有這件事情，我們已不能知道了，我們只能知道，在後人想像中的這件故事是如此的紛歧。」還有許多民間故事，看來「雖是無稽之談，」細察也

¹⁹ 《中國哲學》，第一輯，北京，一九七九。

²⁰ 〈盤庚校釋〉，二。從文字文法語義上攷證今本《盤庚》非商代原文各節，尤為顯著。《歷史學》，第二期。

²¹ 《古史辨》，〈一序〉，七八。康的啟發又見二六。

²² 《古史辨》，〈一序〉，四〇—一、一九—二二。

²³ 胡，〈讀後感〉。《古史辨》，一：一九一—四。董書業，〈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攷據學〉，《批判》，三：二五〇。

²⁴ 《古史辨》，〈一序〉，六、五

有它的「無稽的法則。」²⁵ 一九一八年休學在家，病中為北大歌謠研究會搜集歌謠消遣，一年下來已有了兩百首，經過一番分析與歸納，他竟發現，「和小說、戲劇中的故事一樣，」歌謠也「會得隨時隨地變化。同是一首歌，兩個人唱着便有不同，就是一個人唱歌，也許有把一首分成大同小異的兩首的。有的歌因為形式的改變，以至連意義也隨着改變了。」為了明瞭各種歌詞的意義，在唱本、諺語、方言之外，他的搜集還擴大到風俗和宗教迷信材料。從一九二零年九月起，他的吳歌陸續出現在北京《晨報副刊》之中，一時頗受注意。這一因運適變之嘗試與創新的成功，乃進一步激起他在學術天地中「拓地萬里的雄心。」恰巧那幾年胡適發表的論文很多，其取徑與論旨不但使他終於明白史學是最近於他性情的學問，而且教了他不少研究歷史的方法——〈水滸傳攷證〉讓他認識到演進法在故事研究中的妙用，論井田制的文字更令他恍然大悟，「研究古史也儘可以應用研究故事的方法。」²⁶

是以從一九二一年起，他即嘗試以「歌謠中得到的見解」去整理《詩經》，並發覺故事分化之例頗有助於三百篇的正當理解。²⁷ 隨後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一九二一—五）又使他「親切知道，」這個小故事的若干情節和演變軌跡，與古史傳說頗有類似之處。像古史一樣，它也順隨「文化中心的遷流」而更動，承「各地的時勢和風俗而改變，」憑「民衆的情感和想像而發展。」後出的人性化版本，也像「沒有神話意味的古史」一樣，是經過史家或文人之筆從神話中「篩濾出來的，」猶如禹由傳說中的神變為古史中的王。²⁸ 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之外，他還在一九二四年冬用故事和角色的眼光寫了：〈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和〈宋王偃的紹述先德〉。前文是借紂惡世增代累的經過，以明春秋戰國間所傳說的古史系統如何不可信，「希望大家把它當作《徐文長故事》一類書看，知道古代的〔所謂〕史實完全無異於現代的傳說：天下的暴虐歸于紂與天下的尖刻歸于徐文長是一樣的，紂和桀的相像與徐文長和楊狀元的相像也是一樣的。」〈紹述先德〉一文亦無非是要指出，宋王偃在古史中成為「淫昏暴虐」之君，主要因為他是「紂的後裔。」²⁹ 這裏用的主要是「角色的眼光。」

隨着調查與研究的深入，他愈來愈能體會民俗學對古史攷辨的重要。一九二四年草擬的〈研究古史的計劃〉初次透露，他「他所以致大胆懷疑古史，實因從前看了二年戲，聚了一年歌謠，得到一點民俗學的意味的緣故。」〈計劃〉又指出：「經籍器物上的整理，只是形式上的整理；至於研究古史的內部，要解釋古代各種史話的意義，便須應用民俗學了。」因為「古人的善惡這般的截然分殊（如桀、紂、堯、舜），古人的能力這般的無窮偉大（如禹、黃帝），古人的境遇這般的十分奇特（如后稷、舜），我們還是相信

²⁵ 《古史辨》，〈一序〉，一九、二〇—一，二二、二七。

²⁶ 《古史辨》，〈一序〉，三七、四〇。《吳歌甲集》〈自序〉，一九二七。

²⁷ 《古史辨》，〈一序〉，四八、四九。

²⁸ 《古史辨》，〈一序〉，六七—七〇；一：二七三—四。《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一：一一三—二五，廣州，一九二八。

²⁹ 《古史辨》，二：八二—九三，九三—六。

它呢？還是不相信它呢？」信它嗎，「是愚。」駁它嗎？「是廢話。」解釋它嗎，「也無非是鍛鍊。」因此，最明智的態度，便是以「故事的眼光」去尋求「它們當時傳說中的真相。」³⁰ 次年二月，他又在〈答李玄伯先生書〉中重申此義，又舉例證明它確有意想不到的功能——會一再幫助他「把向來萬想不通的地方想通，」從而「敢打破舊有的古史系統，」並決定以「不立一真、惟窮流變」為古史研究的重點。³¹ 不須多說，這個「惟窮流變」宗旨，亦是胡適演進方法論的引伸。他重視民俗學的另一理由，是以史料學為立足點。《古史辨》冊一〈自序〉辨稱，上古史所以「應當和現在的故事同等看待，」是因為它們原「都是在口耳之間流傳的。」例如禹一類的古史，是一直傳到漢代才因「書籍的普及而凝固」下來，主角的「人格纔沒有因時勢的遷流而改變。」這個遷流的過程就是尚好的史料，從它的流變上，史家「不但可以理出那時人的古史觀念，並且可以用了那時人的古史觀念去看出它的背景，那時的社會制度和思想潮流。」³²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想透過民俗學的研究，尤其是神話和傳說，以及民間的風俗信仰的分析與整理，「把漢以後民衆心中的古史鉤稽出來，」和文人學士所寫定的古史並行。在二十年代期中，他似乎一直在假定，古人原無神話、傳說與史實之分，而重視前二者的程度且有甚於後者。又假定，自漢以後，神話與傳說多被摒於「歷史的範圍以外，」而以各種不同形態與媒介出現於民間。是以，無論是為鉤稽民間古史，還是為確定「古史在古代的地位，」都不能不將古今的神話、傳說、風俗與信仰作貫通的研究。³³ 他的這番構想後來雖未完全實現，但是他對民俗學的偏愛，在史學家中確是前無古人。在《吳歌甲集》與《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一、二、三）之外，他還編了《妙峯山》、《蘇粵的婚喪》之類的民俗叢書，寫過〈泉州的土地、天后〉、〈聖賢文化與民衆文化〉等民俗文章，又為許多民俗學作品寫叙，積極推動民俗材料的印行。³⁴ 直到六十年代，他在這方面的興趣，仍活現於《史林雜識》一書之中。〈拋綵毬〉就是一篇純民俗文字。〈蜀王本紀與華陽國志所記蜀國史事〉一文，無非是要證明古史本原於神話。〈乘龍〉篇則重申治古史不可撇開神話的原則，斷言「若去神話而談古史，猶去嬉戲而談兒童之生活也，烏乎可！」更有趣的是，他還當真按二十年代的構想，寫出了打通古今傳說的〈尾生的故事〉。³⁵ 〈莊子和楚辭中崑崙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的融合〉一文的發表，顯示他對

³⁰ 《古史辨》，一：二一四—五。又〈一序〉，六〇。

³¹ 《古史辨》，一：二七二—三；〈一序〉，六一。又《研究集》，二：二四—五。

³² 《古史辨》，〈一序〉，六五—六。

³³ 《古史辨》，一：二七二、二七四、二一六；〈一序〉，六一、七一—七。《研究集》，三：一〇七、一一七—八。又〈二序〉，七。

³⁴ 《吳歌甲集》係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歌謠研究會出版。《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以下皆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民俗學會印行，時在一九二八年三月與一九三〇年四月之間。見《民俗學集錄》台北影印本，一九七〇。

³⁵ 《雜識》，一一一—二〇、一七一、二一五—二二。

民俗學的興味至死未衰。³⁶當然，我們不應忘記，對他來說，民俗研究自始至終，都是治古史的輔助學科而非正業。因而他對現代史學的直接貢獻，自然還得來自於古史研究的本身，以及由此而顯露的顧頡剛學格。

(二)

頡剛古史學的要旨並不限於疑古和辨僞，攷信方面且是後來居上。他大致是一九二八年前重疑，三十年代尚辨，四十年代由辨僞向攷信過渡，六十年代後則以攷信為主。籠統說來，他的新式古史學重心，在憑借古史傳說的清理和研究，以求「信信疑疑」，以求去僞見真。³⁷導引其各種研究歷「五十年而不變」的「主題思想」，乃是「戰國秦漢時代學說的批判」，因為他深信，後世流傳的古史系統是經漢人整理、寫定，原為當年各學派長期「強古人以就我」的訛誤累積，粗看雖也自成體統，細究則破綻百出，矛盾重重。³⁸在早年，他的首要目標，是繼崔述之後對舊系統作「更進一步」的清算。一九二三年發表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便是為清算舊系統而立的「大胆的假設。」那知此說一出，立即引起學界的強烈反響。錢玄同贊之為「精當絕倫」，說「看了之後，惟有歡喜贊嘆。」胡適之以為他「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傅斯年亦加推許說：「這一個題目，乃是一切經傳子家的總鎖鑰，一部中國古代方術思想史的眞綫索，一個周漢思想的攝鏡！」反對者則斥之為「任情臆造」，「附會周納」，「奇得駭人。」及至輯載有關文獻的《古史辨》第一冊問世（一九二六），一年之內「竟重印了二十版。」³⁹作為《古史辨》主編兼主角的顧氏，亦於五年內一躍而成國際知名的古史家。⁴⁰與此同時，古史研究亦由冷門而一變為顯學，唯物史觀者的拓荒嘗試，如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遂乘運而興。而號稱科學的史學運動中心的北京大學學風亦為之大變，三十年代初的史學系，竟辦得有些像「中國古代史專業。」⁴¹

轟隆的熱潮既退，冷酷無情的現實，尤其是國家動盪，生計艱窘，學林浮薄以及個人學養的不足，迫使他終於澈悟，「破」似易實亦不易，而「立」就難上加難。⁴²於是逐步收斂野心，縮小研究範圍，集中精力於東周以下的若干專題。先是十七條，以「春秋戰國時的神祇與宗教活動」開首，以「古史與故事的比較」殿尾。再縮而為六大項，

³⁶ 《中華文史論叢》，一九七九，二。

³⁷ 《古史辨》，〈一序〉，六六。

³⁸ 引文均見《雜識》，〈小引〉。

³⁹ 《古史辨》，一：八七、九六；二：三三八、二九七。《編寫》（下）。

⁴⁰ 參看Arthur W. Hummel, *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V: 4 (July 1929). 是文原為作者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宣讀的論文。稍後作者又將《古史辨》冊一〈自序〉譯成英文，改名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Leiden: 1931)。

⁴¹ 楊向奎，〈回憶再賁〉，《歷史地理》，創刊號，一九八一。

⁴² 《古史辨》，〈一序〉，八三-五、八七；一：二七一；〈三序〉，二。〈二序〉與〈四序〉又提及一九三〇年左右擬撰《古史攷》與《古史辨》並行未果。

希望透過戰國秦漢間思想學術史的研究，從中找出當時人的「上古史觀念及其所造作的歷史」，而成爲「中古期的上古史說」專家。最後甚至只敢以「審查書本的史料」爲己任，要盡一生力量「把某幾篇古書攷出一個結果來。」⁴³ 成於一九三〇年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便是他所要探討的戰國、秦漢間人的「中心問題」之一，旨在說明此一時期方士、儒生和政治的關係，以及緣此而生的種種僞古史。又如〈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僞與辨僞〉（一九三五），亦是原訂十七條之一的研究結果。一九三四年後積極推動的沿革地理研究，其初衷本爲界定「戰國秦漢時開拓的疆土和想像的地域。」《尚書》的校釋和譯論，在先不過是要攷定「各篇著作時代和著作背景。」他如知識階級古史（視爲正史的傳說）與非知識階級古史（民間自由傳說）的異同，各民族祖先之傳說的演化等，也都是他要探究的「中心問題。」⁴⁴ 一九二六年後，顧氏的學術活動，看來是忽東忽西，或民俗，或民族，或邊疆史地，其實皆以前述之十七條或六大項爲張本。其寓立於破的取徑，更是始終如一。

儘管充分理解「建設真史」「比打倒僞史更重要，」但是在《古史辨》的顛峯時期，他的首要關注一直是破壞僞史。他強調「破壞與建設，只是一事的兩面，不是根本的歧異。」「所以有破壞，正因求建設。」他深信《古史辨》的辨僞去妄，既可「在消極方面」爲攷古學做「掃除」工作，又可「在積極方面」替文獻學家「恢復許多舊產業，」爲「民俗學家闢出許多新園地。」⁴⁵ 他所憑借的史料始終皆以典籍爲主，口述材料爲輔，商、周遺跡居末。「過尊遺作品」而「輕視載記」的傾向，特別是惟信遺物不理載記的極端看法，是他堅決反對的。《古史辨》第三冊〈自序〉辨稱：「前人講古史，只取經書而不取遺物，」固然不當；而今人「講古史，惟敬遺物而不取經書，」又何嘗得宜？⁴⁶ 在他看來，二十世紀的古史家「初懂得用歷史演進的眼光去讀古書，初懂得用古人的遺作品去印證古書，」「滿目是新境界，在載記中即已有無數工作可做。」大家正該儘速「先把古籍上的材料攷證，」從中「研究出一個較可信的狀況」以供攷古學的參攷，以待攷古學的補充與修正。⁴⁷ 然則，導致顧氏辨僞史學一鳴驚人遠勝往古的，乃是他的方法與門徑。

他的方法系統是由三大源流構成。一是得自胡適的「歷史演進的方法」；二是此法的變種——「故事的眼光」；三是原於康有爲但經他發展的「僞」史移用法。此三者每每錯綜並用，但始終以演進法⁴⁸ 爲主。在史料攷訂上，其術是依資料出現的先後排列以攷其源流，以辨其優劣、真僞，這本是我國先進的實錄史家，如裴松之、劉知幾等，和顧炎

⁴³ 《古史辨》，〈一序〉，五八-六一；〈二序〉，六；〈三序〉，五；七；六四。以書爲中心的研究可能受傅斯年影響，參看《古史辨》，二：一四一。

⁴⁴ 《古史辨》，〈一序〉，五九-六〇、六一。

⁴⁵ 《古史辨》，〈四序〉，一九；〈二序〉，四、七；〈三序〉，六。

⁴⁶ 《古史辨》，一：二七〇-一；〈三序〉，七。

⁴⁷ 《古史辨》，一：二七一；〈二序〉，五。

⁴⁸ 《古史辨》，一：一九一-四。

武以下傑出之攷訂學者所公用的方法。在西方，此法本導源於稿本校勘學，十七世紀後逐漸移用於法律文書與史料之攷訂，至十九世紀中葉復因德意志史家之廣泛應用與擴充，終於發展成為批判史家之公器。在史事解說層次，此法應稱進化觀點或歷史態度。此觀點預設：凡同類事物以後出者為優。用之於古史研究，人性愈濃而系統愈完備之古史，當愈為後出，如禹之由天神而人王，舜之由「無為而治」的聖君，而聖人而兼孝子。即以古史學而論，也是後出轉精益形完善。如顧氏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假設，便是崔東壁世愈後古史愈詳說的進化。而他所以能有此發展，正因為他能以發展的觀點看古史與古史學。特別是前文已詳說的「故事的眼光。」這本是進化觀點的變種，即用民間故事特有的性質與演變通例，以觀察並解說系統古史的演變，尤其是傳說成分特多的古史，如堯舜與桀紂之善惡對照，古史神話成分的逐漸減少等等。最簡直的說，便是以昔日的古史與「現在的故事同等看待，」因為兒童和愚民的心智本與初民接近。最後一條，乃是「偽史」移置利用法，即不以「偽」史之載記為所述先世之供證，而以之為該「偽」史或「偽」籍造作之世的遺物或供證，如移〈禹貢〉至戰國時代。他辨稱：「許多偽材料，置之于所偽的時代固不合，但置之于偽作的時代則仍是絕好的史料；我們得了這些史料，便可瞭解那個時代的思想和學術。例如《易傳》，放在孔子時代自然錯誤，」但放在漢代就可以見出那時人對於《周易》的見解及其對於古史的觀念了。」「荒謬如讖緯，我們只要善於使用，正是最寶貴的漢代宗教史料。逞口而談古事如諸子，我們只要善於使用，正是最寶貴的戰國社會史料和思想史料。」⁴⁹所謂「間接史學」(Indirect History)，⁵⁰正由此而得名。

其實移置法不但是顧氏愛用的「獨門武器」，而且也是他辨偽學的實質起點。二十年代初，他曾將前人常用的幾種古史文獻列成兩個對照表。甲表依舊法編目，「看書上說的甚麼時代就放在甚麼時代，如置《三王歷年記》(春秋命歷序)於太古，置〈堯典〉、〈舜典〉、〈皐陶謨〉于唐虞，置《逸周書》、《穆天子傳》于西周。」乙表依新法編目，「看它們在甚麼時代起來的就放在甚麼時代，如置〈虞夏書〉於東周，置《易傳》、《竹書紀年》、〈胙篋篇〉于戰國秦漢間，置〈命歷序〉、《五帝德》于漢，置《帝王世紀》、《偽古文尚書》于晉，置《路史》、《三墳》于南宋。」一經比較，立刻發現彼此所述古史「衝突的劇烈，」年歲愈古，衝突就愈烈。⁵¹跟着，在撰寫《本國史教科書》的上古傳說時，更賴此法發現了「堯、舜、禹的地位問題。」以禹而論，〈商頌〉、〈長發〉看他是「開天闢地的神，」〈魯頌〉〈閟宮〉看他是「一個最早的人王，」而《論語》則當他是「一個耕稼的人王，」最後〈堯典〉竟以他為稷、契的同寅。以堯、舜來說，「《詩經》和《尚書》(除首數篇)中全沒有說到堯、舜；」《論

⁴⁹ 《古史辨》，〈三序〉，八；〈四序〉，一八。又七：三九-四〇、六二-一三。移置說似為梁啟超所首倡。說見《古書真假及其年代》，第五章，一九二七。

⁵⁰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pp. 202-5.

⁵¹ 《古史辨》，〈一序〉，四四-五。

語》中有他們了，但還沒有清楚的事蹟；到《堯典》中，他們的德行政事燦然大備了。」「越是起得後，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農之後，堯、舜又成了晚輩，更不必說禹了。」於是，他就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在從事《尚書》各篇的內容分析中，他又察覺，愈後出的篇章，「人治觀念」愈強，反之，愈先出者，「神道觀念」愈重。這種變遷，不正是政治生活「從神權移到人治」的反映？隨後，他又從各種史籍、戰國諸子和彝器銘辭等遺跡中找到綫索，推出禹「由神變人」的「歷史性質的故事乃是後起的。」而伯夷之由《論語》的「不念舊惡、不肯降志」的君子，一變而為《孟子》中贊美西伯養老的逸士，再變而成《史記》所寫的「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的忠臣，亦說明伯夷其人的歷史形象，經常因政制、思想與時勢而改變。所以到一九二六年，他已確切認定，以訛偽的史料作遺跡用，「不但可以理出那時人的古史觀念，並可以用了那時人的古史觀念去看出它的背景——那時的社會制度和思想潮流。」⁵²用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上，他又進一步證實，像民間故事的人化一樣，「沒有神話的古史，」原「是從神話古史中篩濾出來的。」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和《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等長篇專論中，他曾放手運用此法。不幸，由於他過信「託古改制」的假說，在許多推想與解釋上不免失之於粗疏，甚至流於武斷。然則，他在這方面的創新——以「偽」史作遺跡，據其演變綫索以求其背景並瞭解其社會——決不容忽視。因為只在他「有了新方法後」，他所見到的材料，才「陡然呈露了一種新樣子，」使得他「又欣快又驚詫，終至放大了膽子而叫喊出來，」⁵³於是將古史研究帶入新階段。不過，他的方法論亦有其先天的缺點。第一，以「故事的眼光」看古史傳說，如應用過當，則類乎以兒童心理解釋成人行為。古史固有神話成分，時代愈古，神話成分愈多，但他所研究的中國古史並非全是神話。第二，他的疑古辨偽的重要學說，包括震撼史林的層累假設的在內，多賴默證以立。然默證一法（*argument from silence*），如張蔭麟所指出者，實不可輕用，時代愈古，愈當少用；而「顧氏之論證幾盡用默證而什九皆違反其適用之限度。」⁵⁴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他那「惟窮流變」、「看史蹟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却重」的手法，其實只是化史事重建與史蹟攷證為史料整理，或者說化史學為史料學。

（三）

顧氏對於現代史學的貢獻，其實是破立相當的，儘管在《古史辨》的風頭上，他的古史學會被人譏之為：破而不立，論而不斷。他自己也說，提出的問題多，解決的問題

⁵² 《古史辨》，〈一序〉，五二—三、六四、六五—六；〈四序〉，一八；五：二五九。

⁵³ 引文見《古史辨》，〈一序〉，六八—九、七八—九。

⁵⁴ 《古史辨》，二：二七二—三。

少。⁵⁵ 誠然，在中年以前他一直忙於嘗試以新法看古史，以新說破舊學，但四十年代以後，他的思慮焦點已開始轉向，由破多於立徐徐移往破立兼顧，《史林雜議》便是反映此一轉移的中介作品。最後二十年的工夫，則完全以立為宗，已發表的《尚書》諸篇校釋譯論和待印行的《周公東征史事攷證》，⁵⁶ 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其造詣之高，無論就規模、見識、方法、資料與體例的全體或任何一方而看，已遠在王國維的《尚書》研究之上。所謂「我的成績不能及他，」⁵⁷ 或許只是就他中年以前的建樹而言。不然，恐怕就是晚年的自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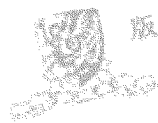
就個別的成績說，他早年最具突破性的創獲有二；其一便是揭穿舊古史系統真像的「層累地造成」說；其二，是甄別古史可信與否的四條設準。所謂「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據他的解釋含「有三個意思。」第一，是說「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愈長，」如「周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第二，是說「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第三，是說今人研究古史，如沿此系統上溯，縱或「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的夏商史；」即使「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⁵⁸ 四條設準呢？（一）以民族言，多元說可信，如「商出於玄鳥，周出於姜嫄，」「楚、夔出於祝融、鬻熊，」各有各的始祖。反之，一元說當是春秋以後民族日趨融合「種族觀念漸淡而一統觀念漸強」時代的產物。（二）以疆域言，其說愈近似秦、漢帝國領域者愈不可信，如「〈禹貢〉的九州，〈堯典〉的四罪，《史記》的黃帝四至」各說，其實是「戰國時七國的疆域，而〈堯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圖，更是秦漢的疆域。」反之，商人「邦畿千里」之說，才是信史。（三）以古史傳說所含的神性與人性比例言，大致神性愈多人性愈少者愈可信；其所含神性應與年歲成正比例，愈古則愈多。反之，「人化」了的遠古之史，乃是春秋末葉諸子勃興以後的改作、附會和偽造。按遠古之世，或「人與神混，」或「人與獸混，」或「獸與神混。」就其「有如是的想像，有如是的祭祀」言，雖「有信史的可能，」但就現代史學原理說，它們只可當作宗教史的素材，不可視為政治史的實錄，「因為宗教是本有的事實，是真的；政治是後出的附會，是假的。」（四）以美化的程度言，說的愈「美善快樂」的愈後出。按「古代很快樂的觀念，」在春秋以前原是沒有的。「所謂王，只有貴的意思，並無好的意思。」要到戰國諸子紛起，為了「依託古王去壓服今王，」便「極力把王功與聖道合在一起；」「於是異於征誅的禪讓之說出來了，

⁵⁵ 參看《古史辨》，〈一序〉，一〇三；〈二序〉，三；〈三序〉，三；〈四序〉，一一二。

⁵⁶ 據負責整理顧氏遺稿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昶華先生來函。

⁵⁷ 《編寫》（下）。

⁵⁸ 〈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一：六〇。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人也出來了，〈堯典〉、〈皋陶謨〉等極盛的人治德化也出來了。」⁵⁹

到了一九三三年，這四條設準又演化出一四「偶像」說。自一九三零年起，他即決定以「中古期的上古史說」為研究主題，四「偶像」說，便是他校準焦點後提出的最具普遍意義的假設。從〈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起，許多討論古史的重要述作，如〈禪讓傳說起于墨家致〉（一九三五）、〈巴蜀與中原的關係說〉（一九四一）等，都是在這組觀念的指導下寫成。依他的瞭解，凝定於漢代的偽古史系統，大體上是以這四大「偶像」為骨幹。如作為種族「偶像」的三皇、五帝系統，原為因應戰國以降民族混合加速政治傾向一統的時勢而造，是原先各自獨立的帝王神靈世系連橫合縱的結果。而作為政治「偶像」的王制，乃是戰國秦漢間儒者託古改制的產兒。「三年之喪廁之於〈堯典〉，五等之爵著之於《春秋》，」便是最佳的例證。至於五德、王統諸說，一望即知為滿足政權更迭頻仍的新形勢而作。第三個影響深遠的「偶像」是道統，乃孟子以後的儒家為自己在倫理界「佔地位」而唱出來的。講求道統說的人相信「天不變，道亦不變，」凡是聖人「都得到這不變之道的全體，」故應在倫理、政治上居絕對的指導地位。第四個「偶像」是所謂經學。按《詩》、《書》、《禮》、《樂》、《易》與《春秋》，本來「都是國君及卿大夫士們的日常應用的東西，」原無「天經地義」的價值。這六者成為「經，」乃是戰國以下，尤其是漢以後，儒者故作神秘自抬身價的結果。而這四者又「都建立在不自然的一元論上。本來語言、風俗不同、祖先姓氏有別的民族，歸於黃帝的一元論。本來隨時改易的禮制，歸於五德三統的一元論。本來救世蔽應世變的紛紛之說，歸於堯舜傳心的一元論。本來思想性質不一致的典籍，歸於孔子編撰的一元論。」這四種一元論又歸於一「道統」之說，「使古代的帝王莫不傳此道統，古代的禮制莫非古帝王之道的表現，而孔子的『經』，更是這個道的記載。」由於有這樣一個道統論為大前提，不只中國古史被「攪亂，」真相被蒙蔽；而思想學術界自漢以後一直在它籠罩之下，以致整個民族長期「喪失了創造力和自信力。」是以在他看來，無論為求古史的真相，抑或為求民族的生存，都該從速拆去這個「偽造的體系和裝點的形態，」回復中國古史「多元的真面目。」好讓大家曉得，「古代真相不過如此，」要使各代的歷史「各各回復其歷史上的地位，真的商、周回復其歷史上的商、周的地位，假的唐、虞、夏、商、周回復其先秦或漢、魏的地位。總之，送它們到博物院去。」亦即是說，要使「古人只成為古人而不成為現代的領導者；」「古史只成為古史而不成為現代的教條；」「古書只成為古書而不成為現代的煌煌法典。」⁶⁰

此外，這一時期受重視的作品，還有〈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這原是標點《崔東壁遺書》的副產品，〈辨偽〉部分尤為重要，有類中國古代批判史學的提綱。〈造偽〉各節指出，古偽史的由來有三：一是諸子的託古濟時；二是經師的「貫通

⁵⁹ 〈答劉、胡兩先生書〉，《古史辨》，一：九九—一〇二。

⁶⁰ 《古史辨》，〈四序〉，五一—三。

群經；」三是史家的「整齊故事。」以託古言，最著名的例子，如堯、舜禪讓的美談，原出於墨子的尚賢主義，堯、舜與文、武周公的仁政，則是孟子王道主義的產兒。至於五德終始與三統循環的歷史規律，本為迎合戰國以後王者或准王者「受命」「改制」的願望而造。神農之世的居居于于，正是道家清淨無為思想的投射。由於儒墨二家先起，故而所造的古史系統短；道家後出，所造系統便不能不長；致漢代以後的史家只好「於前段採道家說，於後段採用儒墨說。」更嚴重的偽誤則出於「貫通群經。」如鄭玄之釋「日若稽古帝堯」，竟直以《堯典》為唐、虞二代文獻；又以《堯典》九官與《周禮》六官湊合，更是偽上加偽。又《爾雅·釋地》所言九州本襲自《呂氏春秋》和《淮南王書》，至東漢竟有人直斷這九州為殷制。他如，「肇十有二州」在《堯典》只是集稱，至馬融竟貫通《禹貢》、《職方》與《釋地》諸篇之說，而列舉其個名，並定為舜制。從「整齊故事」的來源看，司馬遷就造了不少偽史，如用「夏后帝啓」代「夏后帝」，以與帝甲、帝乙、帝辛看齊，又改稱太王為「古公、」王季為「公季，」都犯了張冠李戴、時代顛倒的錯誤。然則，從現代史學的眼光看，講辨偽的各節更值得注意。由《荀子·正論》辨禪讓說「是虛言」起，直至王肅撰《聖證論》以辨偽止，他對戰國秦漢間批判傳統的介紹與批評，迄今仍是中文述作中最佳的一篇。此文顯示，在先秦諸子中以法家最具歷史意識與分析頭腦。繼《荀子》駁堯舜禪讓、「古無肉刑而有象刑」之後，韓非在《顯學》篇中斥「明舉先王，必定堯舜者」是「非愚則誣」，因為「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使誰定儒墨之誠？」再者，「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曰：「非愚則誣」。入漢以後，顧氏首先介紹的，是《史記》攷信、闕疑與去「不雅馴」之言的態度，和「審查古史料的標準」；然後是《漢書·藝文志》辨偽書的成績。在經學家的述作中，他對馬融（79-166）《書序》評《泰誓》的話最為激賞，贊它「有見解，有證據，宛若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縮影，」不像「漢人文字。」此外，他還道及許慎的「辨偽著作」《五經異義》，鄭玄疑《月令》，盧植疑《王制》，臨碩疑《周禮》，何休疑《左氏》和《穀梁》。至於《論衡》，可惜只提及它「于古籍和傳統無所不疑，」但未作詳明分析。⁶¹

在「最後三十年」⁶²中，繼《史林雜識》問世以來，他在古史研究上最突出的業績，自然要數《尚書》諸篇的注解，校釋與譯論了。在一九六零年前後刊布的《禹貢全文注釋》（一九五九）和《尚書大誥今譯》（摘要，一九六二）之外，⁶³近幾年發表的還有：《尚書甘誓校釋譯論》，⁶⁴《盤庚三篇校釋譯論》，⁶⁵《尚書湯誓校釋譯論》，⁶⁶

⁶¹ 燕京大學《史學年報》，二卷二期，一九三五。後收入《古史辨》第七冊。引語見該文〈附言〉。《古史辨》，七：六三。

⁶² Ursula Richter, *Gu Jiegang: His Last Thirty Years*, *The China Quarterly*, No.90 (June, 1982).

⁶³ 侯仁之篇，《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九。

⁶⁴ 《中國史研究》，第一期，一九七九。

⁶⁵ 《歷史學》，第一、二期，一九七九。

⁶⁶ 《鄭州大學學報》，第一期，一九八〇。



〈西伯勘黎校釋譯論〉。⁶⁷ 歷盡六十年的滄桑與曲折，他終能合疑古、辨僞、攷信爲一，在劉起釭先生的協助下，寫出他一生最圓熟的謹嚴之作。遺憾的是，迄今爲止已印行的《尚書》諸篇校釋譯論，僅僅約當於原計劃的五分之一。按顧氏着手整理《尚書》實始於一九二三年，本打算先辨〈禹貢〉、〈堯典〉，旋改爲今譯，在兩年中完成了三篇譯文。⁶⁸ 一九二六年起，由於教學和研究的需要，《尚書》一直是他集中精力整治的古籍之一。先是輯材料，然後編講義，自一九二九年由中山大學移席燕京、北大後，爲配合兩校「尚書研究」課程的教學，遂陸續編成《尚書研究講義》五種，《尚書文字合編》、《尚書通檢》（童書業代編）和《尚書學討論集》各一。⁶⁹ 按原定計劃，凡出世較晚的篇章如〈堯典〉、〈禹貢〉等，便直逕據「歷史地理」的材料以攷定其撰述年代。而編成較早的各篇，就先從校勘入手，一明文句訛誤，二定版本異同。然後再彙合歷代學者的討論，通其同會其異，以求可採的定論。最後再據已攷定的各篇文字和甲骨文、金文比較，以求各篇造句用字文法。⁷⁰ 《堯典評論》和《堯典問題集》（上海開明，一九三七），便是這一階段的重要成果的一部分。不幸事與願違，這一已入正軌漸趨成熟的研究，不能不因抗戰爆發而中斷，八年中只撰就〈校點尚書禹貢篇〉（《說文》，一九四四）一文。直到十年後他進入北京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時，才得重理舊業，憑借前此的心得，草成〈禹貢全文注釋〉一篇。「三面紅旗」（一九五八—六〇）的狂瀾既退，學者復准各按一己之專長作深入研究，顧氏亦得再續前緣，不久遂有〈大誥今譯〉（摘要）（一九六二）的問世。研究既時斷時續，而各文的譯作又先後相去近六十年，其質素自然參差不齊。就已發表的各篇校釋而論，當以晚成的〈盤庚三篇校釋〉爲上上之作，是篇無疑乃顧氏畢生功力的凝聚。它不但會通了漢魏以後各類專家學說的精華，而且抉擇準當，論斷公允，其疏證之詳明精確與綿密細致更在王國維之上。至於資料繁富，體例創新與雙重證據配搭的揮灑自如，猶在其次。顧氏所以有此空前創獲，關鍵仍在方法，文法語意演進觀點的運用尤爲成功。〈討論〉一·（3）駁郭沫若釋「象」與「民」爲奴隸之說，極具說服力，雖郭氏復生，恐亦不能不爲之折服。美中不足的，是在理論的應用上，仍有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好將只是或然有效的經驗通例或分析設準，作絕對有效的必然鐵則使用，如〈討論〉五駁傅筑夫〈關於殷人不常厥邑的一個經濟解釋〉時說：「既是公例，就是不能破例的。」又說盤庚遷殷，「必然是爲了對付」某些方國。於恩格斯學說的引據，有時也不免失之於牽強附會。⁷¹ 在他篇〈釋論〉中，亦偶爾有類似的疏失。

⁶⁷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一集，湖南人民，一九八〇。

⁶⁸ 《古史辨》，一：二〇六、一八八。三篇譯文依次爲〈盤庚〉（中），〈盤庚〉（上）和〈金縢〉，前書，二：四三—七五。

⁶⁹ 〈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第二學期講義序目〉，一九三〇。《古史辨》，五：二五九；〈四序〉，四、五。白壽彝，〈悼念顧頡剛先生〉。童代編事見《春秋左傳研究》，顧〈序〉，上海人民，一九八〇。

⁷⁰ 《歷史學》，二：三四、四六—七，一九七九。

⁷¹ 《尚書通檢》序，北京，一九三六。

(四)

顧氏對新史學發展的另一重大功績，是開拓研究領域與推進學術活動。在二十年代，以民俗學探索為主；在三、四十年年代，則以促進歷史地理、邊疆地理和少數民族史研究為中心。他對民俗學的興趣，如前文所示，是因觀賞京戲與採集民間歌謠而起，後因孟姜女故事研究（一九二一—五）而擴大。他在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執教不足一年（一九二六—七），竟花了半年時間在廈門、泉州、福州等地「搜集風俗物品，」儘管當地同情的人極少。到廣州中山大學（一九二七）後，他立即發起組織民俗學會，附設於該校的語言歷史研究所中，並極力「主張把收到的材料多多刊印，」⁷²於是民俗學會不久即有《民俗周刊》與《民俗小叢書》的印行。《周刊》於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創刊，顧親自為它撰寫發刊詞，讀來就像是「一篇新史學運動的宣言。」⁷³從一九二八年起的兩年半時間中，《民俗小叢書》共出了三十四冊。《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共佔三冊，第一冊是他的研究論文，二、三兩冊是討論文集。在餘下的各卷中，他經手編的有兩種，由他寫序的有九種。⁷⁴抗戰期中，他又和妻子匡合編了《采風》、《風土雜誌》和《風物志集刊》。⁷⁵他所以如此熱心於民俗學的推廣和探討，固然與他愛學好奇的性格有關，不過主要還是用它做「歷史研究的輔助」與「旁證，」特別是借民間傳說演變的例去理解古史，闡明古史傳說的意義。其次是由於他相信，正如文學之有朝野區分，歷史也有士人寫定的正史和民間流傳的口碑之別，而後者或許比前者更接近真實，對民衆更有意義，故不容新史學家忽畧。⁷⁶西方學者重視顧氏民俗學研究的雖不乏其人，可惜過分着眼於他的民衆觀點，反而忽視了它與古史研究的血肉關聯。⁷⁷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咄咄逼人，由東北四省的佔領而東蒙的割裂（一九三一—五），素來以民族前途與國家命運為憂的顧氏，遂不得不暫時擱置其純學術觀點，而求學用結合，將研究焦點由「中古期的上古史說」轉向中國歷史地理和民族演進史，以及邊疆史地。查顧氏之注意歷史地理問題，本因禹的攷辨而起，由大禹的傳說而〈禹貢〉，而及於戰國秦漢間的地理沿革。早在一九二六年，他已發願要釐清這一歷史時期的中國疆域變遷，並列為中心關注之一。⁷⁸及至熱河不戰而失（一九三三），察、綏

⁷² 謝雲聲編，《閩歌甲集》序，一九二八。台北本，一九六九。

⁷³ 楊堃，〈關於民俗學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叢刊》，第二期，一九八二。

⁷⁴ 據《中山大學民俗叢書》台北翻印版，一九六九。《叢書》的弁言亦出於顧氏。

⁷⁵ 楊堃，前文。

⁷⁶ 《古史辨》，〈一序〉，五九—六一、七五、七七。《民俗周刊》，〈發刊詞〉，一九二八。《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一〉，〈自序〉，編者介紹。廣州，一九二八。吳藻汀編，〈泉州民間傳說〉序。姚逸之、鍾貞助述，〈湖南唱本提要〉序，台北本，一九六九。

⁷⁷ 如加州大學的艾伯林德教授(Prof. Wolfram Eberhard)和紐約州立大學的余尼德博士(Dr. Laurance A. Schneider)，參看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pp. xi, 121-52.

⁷⁸ 《古史辨》，〈一序〉，五九、六五。

兩省危在旦夕，他便與譚其驥氏聯合發起創辦《禹貢半月刊》，倡導在清人樸學的基礎上以「科學方法」研究歷史地理。⁷⁹ 明年禹貢學會成立，遂改以「研究中國地理沿革史與民族演進史」並重。⁸⁰ 稍後日閥吞併內蒙的野心昭然若揭，該刊復以邊疆地理與歷史為首要重點，從一九三六年十月起先後編印了好幾個專號，以對抗日本御用學者的陰謀，由《東北研究》、《西北研究》，而《康、藏、察綏》，而《後套水利調查》專號，直至抗日戰爭爆發為止。⁸¹ 他還親自去河套地區攷察，開現代古史學者從事「田野研究」的先例。從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他先後「跋涉於洮漳西傾者」約一年，據當地「風尚」以證古史，頗有所得。⁸² 隨後因流寓滇、川之故，他對邊疆史地的注意焦點，遂由西北移至西南，既為昆明《益世報》主編《邊疆附刊》，亦多以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為論題，以致引起傅斯年的不滿，要求他將該刊更名為《雲南附刊》或《西南附刊》，並在通俗文章中「莫談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以免導致誤解，加深中央與地方的隔閡。⁸³ 此外，他還主編過三期《民族學研究》集刊，和《西南邊疆》等期刊。⁴⁸ 在這些活動中，自以創辦《禹貢半月刊》和禹貢學會最為重要，非但在當時備受注意，竟使日本特務將他列入黑名單，⁸⁵ 而且嗣後證明其影響亦極為深遠。誠如《歷史地理》的編者所說，中國「當代的歷史地理研究，」是在他「倡導下開展起來的。」「更重要的」是，通過禹貢學會的活動，他為亟需專才的中國「培養了一批歷史地理學的專門研究」者，「為建立、發展這一科學扎下了基礎。」⁸⁶ 禹貢學會的成長確是出乎意料的快速，到第三年時，會員已達四百人，今日中國歷史地理學的中堅分子多是當年的會員。例如，去年才創刊的《歷史地理》（中國歷史地理學會機關刊物）共有兩位副主編，其中侯仁之教授是他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班上的學生，學會最早的會員之一；史念海教授，亦是當年直接受過他鼓勵與指導的會員之一。至於主編譚其驥教授，不但是他燕大研究院的學生，且是他創辦《禹貢半月刊》的副手。⁸⁷

另外不可不提的，還有他和「新史學會」的關係。一九四二年，他曾和唯物史觀派的積極分子杜國岸、侯外廬等人攜手在重慶成立了「新史學會」，張志讓、周谷城也都

⁷⁹ 《禹貢》，〈發刊詞〉。此文乃譚其驥教授執筆，願修改。〈王煦華先生來函〉，《史學史研究》，第四期，一九八一。

⁸⁰ 〈學會簡章〉，《禹貢》，四卷三期，一九三五。

⁸¹ 有關《禹貢》學會及半月刊的活動，可參看徐兆奎，〈禹貢學會的歷史地理研究工作〉，以及侯仁之，楊向奎等，〈紀念禹貢筆談〉的短文。《歷史地理》，創刊號，一九八一，十一月。

⁸² 《雜識》，〈小引〉。細節可參看與王鍾麒合撰之《西北攷察日記》，北京，一九四九。

⁸³ 〈致顧頡剛函〉，〈致朱家驊杭立武函〉，《傅斯年全集》，七，台北，一九八〇。

⁸⁴ 楊堃，前引文。

⁸⁵ 《雜識》，〈小引〉。日人嫉視的另一原因，是顧氏當時還辦一三戶書社，專門編印抗日通俗讀物。

⁸⁶ 〈沉痛悼念顧頡剛先生〉，《歷史地理》，創刊號。

⁸⁷ 徐兆奎，前引文。侯仁之，〈發刊詞〉，〈回憶與希望〉。楊向奎，〈回憶禹貢〉。各文均見《歷史地理》，創刊號。〈史念海自傳〉見《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一：四六-八，太原，一九八二。葛周，〈譚其驥與中國歷史地理學〉，《中國史研究》，第四期，一九八二。

是參與者之一。顧氏與唯物派學人的接觸雖始於二十年代，但參與以他們為主體的學會，這還是第一回。⁸⁸

(五)

然則從更長遠的觀點看，最值得人懷念的，恐怕還是他那嗜學如命的性格，探索真理的豪情和開拓門徑的興味，語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現代史學家中，他無疑是極少數樂學的學者之一；既能在學問中體會到「真實的美感」，又能在探索中感受到「不盡的歡喜」。⁸⁹他對知識的「饑渴」，對真理的「熱心」和「不厭不倦」的興味，可以說是與生俱來。據自述，他自幼即富好奇心，喜歡查東問西，又愛「打碎烏盆問到底」，「在不曾得到解答時的時候只覺得胸中煩悶的不可耐」。⁹⁰他那「收不住的學問野心，也是很早就顯露出來的。十二歲時，曾作〈恨不能〉三篇，第三就是〈恨不能讀盡天下圖書〉。他從小就喜歡買書，到「十一、二歲已成為習慣」，「每天一下課，立刻往書肆裏跑。」在三十歲左右，他的私人藏書已達兩萬多冊。⁹¹在當年那種「士不悅學」，「時勢只許人發議論而不許人讀書」的歲月中，他獨以「蝨蠅」自命，以「紮硬寨打死仗」的工夫治學，人或認為「太自苦」，他反而獨得其樂。讀到久求方得的《崔東壁遺書》大快；發現《紅樓夢》新材料亦大快；無意之中獲得一些孟姜女的載記，更是感到「極度的快樂。」見到他人從海外把資料找回來，亦令他有「說不盡的欣慰」，而生出由衷的感謝。⁹²與師友論學，交換新知和心得固然深感樂趣，即使在學問上遭人批評責難，他也感到高興。錯誤得他人指正會使他高興，自己發現錯誤而更正則越發高興。⁹³有了「新眼光」「新方法」後，更有說「不盡的喜樂」、「欣快」和「驚訝」，連「身上的疾苦」也「丟向九霄雲外去了」。⁹⁴總之，任何新發現新開展都能激起他的追求興味，為他帶來「真快樂」。⁹⁵所以他「只願一生讀書，做一個科學的史學者」，將「全生命傾注於學問生活之內。」一九二三年，他回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任職，雖明知待遇不如上海，而且經常欠薪，但為了滿足「學問的嗜好」，也就淡泊自甘了。正因為如此，他極不願意拿學問當商品，做「生計的奴僕」，所以「雖困窮

⁸⁸ 侯外廬，〈坎坷的歷程〉，《中國哲學》，六：三八三。在樓社同仁中，沈雁冰（茅盾）是一九二〇年十月參加上海共產黨小組的元老黨員，范文瀾是一九二六年入黨。參看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一五三，香港，一九八一；《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三五〇，北京，一九七九；《編寫》（下）。

⁸⁹ 《古史辨》，〈一序〉，五四、九五、九八、五五、八一。

⁹⁰ 《古史辨》，〈一序〉，九、十、三三、四五、七九；一：二一七。

⁹¹ 《古史辨》，〈一序〉，一五、五六。

⁹² 《古史辨》〈一序〉，四五、八八；二：三二二—三。《紅樓夢討論通信》，《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四；一七、二八。《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二：二一、四八；三：二一—二、九四。

⁹³ 《古史辨》〈一序〉，四七；一：九七、一八七。《研究集》，二：二七。

⁹⁴ 《古史辨》，〈一序〉，五五、七九。

⁹⁵ 《古史辨》，〈一序〉，八一—二。



到了極端，賣稿的事情卻始終沒有做過幾回。」⁹⁶而他「有生以來的最長最暢的文章」——《古史辨》第一冊〈自序〉，更是在飛機盤旋，砲聲彈聲時斷時續中寫成。其時，「北京大學的薪金，」在「兩個多月之中只領到一個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領幾成時要在哪一月了。友朋相見，大家只有皺眉嗟嘆，或者竟要淚隨聲下。」⁹⁷

在樂學之外，他還肯定為學只問真偽然否，不問家法宗派的準則，他畢生堅持中華民族多元說，從未因政治、社會的壓力而動搖。⁹⁸《古史辨》冊一〈自序〉明確表示，學問「只當問真不真，不當問用不用。」「應用只是學問的自然結果，而不是着手做學問的目的。」又說：「學問是只應問然否，而不應問善惡的。」他還強調，他「心中沒有一個偶像，」也「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但知本「固有的是非之心，」依「證據而說話，」雖然為要瞭解各家派的歷史地位，不免要對它們有所尋繹，但如此做「只是研究，不是服從。」⁹⁹他相信，「保持客觀的態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觀察種種不同的派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不能完全不偏，總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點。」遠在一九一五年，他已接受了經章太炎轉述的史鑑論，認為「史之於美惡，若鏡之照形，不因美而顯，不因惡而隱，」並開始主張學術史當「捨主奴之見，屏家學之習，」而「是非兼收，爭論並列。」¹⁰⁰成名以後，顧氏仍不時強調此義，說：「吾輩研究歷史者注重證據，重證據必重然否，其目的在止於至真。」對於長期爭論的學術史，如今古文問題，學者更應打破成見，解除道統與學派的雙重束縛，以便從事「客觀研究。」¹⁰¹在不拜偶像不入家派這兩節上，他們的堅持尤為突出。以馬克斯歷史唯物論為例，從二十年代中起，他已嘗試利用，但他自始至終不是歷史唯物論者。似乎一開始他已看穿其限制。一九二六年冬他曾函詢留學英、德六年歸國不久的傅斯年，說：「用唯物史觀來看孔子的學說，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會的產物。秦漢以下不是封建社會了，何以他的學說竟會支配得這樣長久？」¹⁰²一九三三年，他更坦然宣示，他並「不反對唯物史觀，」甚至認為「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時」「不該不取唯物史觀為其基本觀念。」不過，他強調「唯物史觀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內都滲入些。」如「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蹟，書籍真偽，需用於唯物史觀」者即「甚少」。相反地，唯物史觀者却亟需「校勘和攷證學者的」幫助。是以他重申倡之多年的「分工」原則，堅持「學問各有其領域，亦當各以其所得相輔助，不必『東風壓倒西風』纔算快意。況且……，把古史和古書的真偽

⁹⁶ 《古史辨》，一：三六；〈一序〉，八二、八六、九六—七。

⁹⁷ 《古史辨》，〈一序〉，一〇一—二。

⁹⁸ 多先說參看《古史辨》，一：九九；〈四序〉，五—七。〈四序〉特別強調，多元是「歷史上的真相，我們研究學問的，在現在科學昌明之世，決不該再替古人圓謊了。」受迫害的經過可參看《編寫》（下）。抗戰期中為編《邊疆附刊》事，亦曾惹起學術界的指責。（參看注83）

⁹⁹ 《古史辨》，〈一序〉，二五，八一—三。

¹⁰⁰ 《古史辨》，〈一序〉，八一、三〇—三。為學問而學問說與梁啟超有類似處。梁說見《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專集》，三四：三六。

¹⁰¹ 《古史辨》，二：一二七；〈三序〉，一、九；〈五序〉，三。

¹⁰² 《古史辨》，二：一五〇。

弄清楚……將來從事唯物史觀的人要搜取材料時就更方便了，不會得錯用了。是則我們的『下學』適以利唯物史觀者的『上達』。」¹⁰³雖在馬克思主義者取得中國政權、唯物史觀成爲官方教義以後，他的這一立場絲毫未曾改變。誠然，爲了「生存」，在政治運動風大勢勁的當口，他也不能不一再批判胡適，大聲感謝黨政領袖的恩典和英明，或間中引用一些恩格斯、馬克斯的語句作護符，以維持其「分工合作」的原則，繼續從事其「下學」的古史研究，直至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廿五日死於腦溢血爲止。¹⁰⁴

既然以學問首重眞僞然否，自然會重材料重證據，並在研究上不惜「小題大做。」他那種但求材料完備，不辭勞苦、不貪名利的勤敏風格，確是現代學人所罕見。他自稱有一「壞脾氣，」一有「問題橫在心中，便坐立不安，想去尋找材料，」以致「精神容易旁逸斜出，」「弄得筆記上甚麼東西都有得紀錄。」¹⁰⁵他的〈孟姜女故事的轉變〉所以只能寫出一半，宋以後再寫不下去，便是因爲材料愈積愈多。儘盡找到了八十萬字，還說是「極不完全的。」¹⁰⁶他受胡、錢委托標點的《崔東壁遺書》，所以拖了差不多十五年才得印行，便是由於他「好求完備的癖性，」總想把有關遺書的材料輯出，「作論世知人的一助。」他的長序，「十年之內起了三回稿，可是沒有一次寫成，」也是爲了同樣的原因。¹⁰⁷至於「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爲學亦當從小處着手的道理，在北大讀書時已有所悟，到二十年代中已標明爲確定的主張，認爲「不做學問則已，如其要做學問，便應當從最小的地方做起。」學者的本分就像農夫和土工一樣，須「一粒一粒地播種，一簣一簣地畚土。」又說：「我知道學問是一點一滴積起來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決沒有頓悟的奇蹟，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細磨的工夫上，毫不存微徼取巧之心。」¹⁰⁸研究愈深入，他愈知中國學術界於「深澈的工作」做得太少。感嘆傷痛之餘，他總是自勉勉人地說：「學者本是作苦工的人而不是享受的人，只要有問題發生，便是學者工作的區域；這種工作雖可自由取舍，但不應用功利的眼光去定問題的取舍，更不應因其困難複雜而貪懶不幹。」又說：「我們處於今日，只有作苦工的義務而沒有吃現成飯的權利。」切不該妄想「速成」或「不勞而獲。」¹⁰⁹反之，須人人抱「寧可勞而不獲，不可不勞而獲」

¹⁰³ 《古史辨》，〈四序〉，二二-三。又〈三序〉，六。亦見於《編寫》（下）。

¹⁰⁴ 關於他「自我批評」的言論可參看：（1）〈從我自己看胡適〉，《大公報》，十一、十六，一九五一。（2）《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序〉，十二、三，一九五四；〈重版前言〉，（一九七八年一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3）〈在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人民日報》，十二、廿五，一九五四。（4）《古籍攷辨叢刊》，〈序〉（二、二八，一九五五），上海中華，一九五五。晚年表態的文字可參看（1）〈徹底批判幫史學，努力作出新貢獻〉，《中華文史論叢》，第七輯，一九七八。（2）《春秋左傳研究》（董書業撰），〈序〉（一九八〇年七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3）〈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下），《中國哲學》，第六輯，一九八一。一九五〇年以來的三十年中，顧氏發表論文共二十餘篇，絕大多數爲純攷證文章，間中雖偶而提及唯物史觀與馬克思主義學說，其態度與一九年三三所持者並無二致。

¹⁰⁵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二：一四。《古史辨》，〈一序〉，五四。

¹⁰⁶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一，〈自序〉。又同書頁一三一、一三三。

¹⁰⁷ 《崔東壁遺書》（董東版）〈自序〉，〈胡適序〉。

¹⁰⁸ 《古史辨》，〈一序〉，三四、八三。又參看〈二序〉，五；〈四序〉，二。

¹⁰⁹ 《古史辨》，〈一序〉，八四-五；〈四序〉，二一-二。引文見〈三序〉，九、六。

之心，而後乃有真學術可言。¹¹⁰他又辯稱，其實「天下事只有做不做，沒有小不小，只要你肯做，便無論甚麼小問題都會有極豐富的材料。」而且小問題的解決通常是大問題解決的先決條件，由小而中，由中而大，乃是正常途徑，只要大家「努力從事于小問題的研究而得到結論，則將來不怕沒有一個總結論出來。」何況，「任何學問都是性急不來的」呢！¹¹¹所以在三十一歲時他只敢自期三十年後才有大成。執教於燕大後，又在自己的寓所掛上「晚成堂」的匾額，借以自警。所謂「成，」也不過是一名以「思想史與學術史」為專業的「戰國秦漢史家。」¹¹²他晚年的成就雖未以此為限，但自廿七歲起，除國家戰亂，政治運動的干擾外，他一生的確在為建設真史學而做「苦工，」年復一年長達半個世紀以上。

顧氏學格的另一珍奇，是他敢於示人以真面目，勇於承認、修正錯誤和樂於面對他人的駁議。在三十年代以前，他再三表示「自知學力淺薄，」¹¹³坦認「學問」與「智識的根底」不好，以及「常識的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練，」以致深感「眼高手低」之苦。¹¹⁴他又直言，外國語文「雖讀過四種，」但「沒有一種讀好。」甚至於他自以為較有把握的研究方法，也自認「所實知的遠不及」他「所標榜的。」有時且逕直懷疑，現代的「科學方法」是否真如他所知的那麼「簡單」「零碎？」¹¹⁵他的自述還暗示，歷史學的若干輔助學科他也未讀好，或者從未碰過。所以在一九二四年擬訂的「研究古史的計劃」中，便規定每日「讀常識書」四小時，從各種通史、專史、天文、數學，直至地理、地質、語言、社會、政治、法律、經濟、統計等學科，應有盡有。¹¹⁶至於在古史研究上的錯誤和缺點，他「很高興得到他人的指正，更高興自己找出錯誤而更正。」其所持基本態度是：一不修飾遮瞞；二不強詞狡辯；三是「應該修正的修正，應該取消的取消。」¹¹⁷若干明知有錯誤的文章仍照原樣收入《古史辨》便是明証，他不但不刪削增竄，且註明錯誤之所在。請以「禹為動物，出於九鼎」為例，這個一度成為爭論焦點的假設，一經錢玄同指正，便立即放棄。¹¹⁸又如〈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文有兩處錯誤，都是關於杞梁妻哭泣崩城的，一經自己發覺，便趕忙更正。¹¹⁹再如，五十年代中，抗戰前印行的《漢代學術史畧》，更名《秦漢的方士與儒生》重版，他便在序文中以純學術觀點批評了此書的缺失，指出「尚有很多的輝煌的」學術果實，「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史畧》卻輕輕放過；還有與漢代學術興替蛻化「有極大的關係」的四次「學術性的大會議，」

110 《史念海自傳》。引文見《傳畧》，頁四八。

111 《研究集》，一：一一四。《古史辨》，〈二序〉，三；〈四序〉，二三。

112 《古史辨》，一：二一六-七；〈二序〉，六。《編寫》（下）。

113 《古史辨》，一：二一七；〈一序〉，八〇、二〇三；〈二序〉，五。

114 《古史辨》，〈一序〉，八三、九二、九四、九六。

115 《古史辨》，〈一序〉，九二、九四、九五。

116 《古史辨》，一：二一二。

117 《古史辨》，一：一〇五。

118 《古史辨》，一：二二七；〈二序〉，三。

119 《研究集》，一：一七-八；二：二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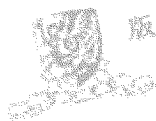
亦「大都沒有叙及。」¹²⁰以上只是幾個著名的例子。其實熟讀顧氏述作的人皆知，他是經常在修正或放棄謬說誤論以求真是非的。他所以勇於面對反詰與批評並樂於提倡討論，也是爲了求真是非。七大冊《古史辨》從頭到尾都以討論集形式出現，又盡量輯入反駁和批評其古史學說的文章，便是爲了「想改變學術界的不動思想和『暖暖姝姝於一先生之說』的舊習慣，另造成一種討論學術的風氣，造成學者們的容受商榷的度量，」和「自己感到煩悶而要求解決的慾望。」同時也「希望大家都能用了他自己的智慧對於一切問題發表意見，同時又真能接受他人的切磋。」因爲「一個人的議論就使武斷，只要有人肯出來矯正，便可令他發生自覺的評判，不致誤人。就使提出問題的人不武斷而反對他的人武斷，這也不妨，因爲它正可因人們的駁詰而愈顯其不可動搖的理由。」他深信，「必須如此纔可逼得許多人用了自己的理智作審擇的功夫。」¹²¹還有隨着自由批判風氣的開展，學術界精神自會活潑，成績也自會豐富。更何況這種「是非兼收，爭論並列」的文集，既是「很好的思想史的材料，又是很好的史學方法論的材料。」¹²²

一九八二年八月初稿，十一月中增訂。

120 《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古籍，一九七八新版。

121 《古史辨》，〈三序〉，三。

122 《古史辨》，〈四序〉，一五；〈二序〉，二。



顧頡剛最後三十年著述簡表（一九五一至八二）

（一）舊作新刊

- （1）《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原名《漢代學術史畧》，上海亞細亞書店，一九三五），上海人民，一九五五；上海古籍，一九七八。
- （2）《古籍攷辨叢刊》（一）（原名《辨僞叢刊》，北京樸社，一九二八—三五），上海中華，一九五五。
- （3）《論巴蜀與中原的關係》（文集），四川人民，一九八一。
- （4）《古史辨》，八卷本，（新增第八卷《古代地理之攷辨》，王煦華編）。上海古籍，預定一九八二—三。

（二）新撰學術論著

- （1）〈穆天子傳及其著作時代〉，《文史哲》，一卷二期，一九五一。
- （2）〈戰國策之古本與今本〉，《歷史研究》，第九期，一九五七。
- （3）〈息壤攷〉，《文史哲》，第十期，一九五七。
- （4）〈禹貢全文注釋〉，見侯仁之編，《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九；香港翻印本，一九六三。
- （5）〈尚書大誥今譯〉（摘要），《歷史研究》，第四期，一九六二。
- （6）《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一九六三，一九七七。
- （7）〈尚書甘誓校釋譯論〉（與劉起鈞合撰），《中國史研究》，第一期，一九七九。
- （8）〈盤庚三篇校釋譯論〉（與劉起鈞合撰），《歷史學》，第一、二期，一九七九。
- （9）〈莊子和楚辭中崑崙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的融合〉，《中華文史論叢》，第二輯，上海古籍，一九七九。
- （10）〈周公之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文史》，第六期，北京中華，一九七九。
- （11）〈聖賢觀念和字義的改變〉，《中國哲學》，第一輯，北京三聯，一九七九。
- （12）〈尚書〉，載《百科知識》，三，中國百科全書出版社，一九七九。
- （13）〈從古籍中探索我國西部民族——羌族〉，《社會科學戰綫》，第一期，一九八〇。
- （14）〈尚書湯誓校釋譯論〉，（與劉起鈞合撰）《鄭州大學學報》，第一期，一九八〇。

- (15) 〈尚書西伯戡黎校釋譯論〉(與劉起鈺合撰)，《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一集，湖南人民，一九八〇。
- (16) 〈夏和中國〉(與王樹民合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一輯，陝西人民，一九八〇。
- (17) 〈禹貢中的昆崙〉，《歷史地理》，創刊號，上海，一九八一。
- (18) 〈山海經中的昆崙篇〉，《中國社會科學》，第一期，一九八二。

(三) 其他

- (1) 〈從我自己看胡適〉，《大公報》，十二、十六，一九五一。
- (2) 《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序〉十二、三，一九五四；上海人民，一九五五。
- (3) 〈在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人民日報》，十二、廿五，一九五四。
- (4) 《史林雜識》(初編)小引，十、三十，一九六二；北京中華，一九六三。
- (5) 〈必須徹底批判幫史學〉，《光明日報》，三、三，一九七八。
- (6) 〈努力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人民日報》，三、十一，一九七八。
- (7) 〈徹底批判幫史學，努力作出新貢獻〉，《中華文史論叢》，第七輯，一九七八。
- (8) 〈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上)，《中國哲學》，第二輯，一九八〇。
- (9) 〈我所知道的蔡元培先生〉，《中國哲學》，第四輯，一九八〇。
- (10) 《春秋左傳研究》(童書業著)〈序〉，一九八〇，七月，上海人民，一九八〇。
- (11) 〈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下)，《中國哲學》，第六輯，一九八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Ku Chieh-kang's New Approaches to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A Summary

Hsu Kwan-san

This work is one of the results of the author's study on Chinese new historiography since 1900. In contrast with previous presentations focusing either on his role as a young "scientific historian," an "iconoclastic editor," or on his penetrating studies of the *Book of Documents* in his last three years after the "Ten Years of Catastrophe" (1966-76), this 18,000 word article attempts to present a complete picture of Ku Chieh-kang's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life from the days of a liberal scholar pursuing scientific history in the romantic era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to the years of an elder Shang Shu specialist under the Communist rule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is life time study on history of Chinese antiquity and his farreaching contribution to studies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its establishment as a new branch of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There are three themes running through this essay. First of all, it explains with ample evidence that certainly Ku was not a believer in iconoclasm, but an honest truth seeker. For him to doubt the doubtful and to believe the believable are both necessar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torical truth, and in many cases doubtfulness even more necessary for seeking a scientific truth. Secondly, it argues convincingly that his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 except a few minor points at technical level, had nothing in common with Wang Kuo-wei in spite of his claims in the late 70s; and that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Ku had remained a loyal student of Hu Shih until his last days although he did publicly criticize Hu's bourgeois pragmatic historiography on several significant occasions. The author also noted that there was a big difference in their application of the so-called evolutionary method. Third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since 1920 Ku Chieh-kang's academic interest had always focused on history of high and middle antiquity, his activities in the field of folklore was nothing but a supplementary approach for his historical research. Judging by his own words, Ku had never considered himself a folklorist as some Western scholars suggested.